

古交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太原市古交工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简况·····	褚国荣 (1)
我在古交工作的片断回忆·····	任悟僧 (6)
西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后·····	郭维屏 (21)
罗沛在交城的抗日活动·····	郝锦奎整理 (27)
独二旅解放古交·····	赵文星 (41)
虎伏山战斗·····	赵国玺 (44)
大川的对敌斗争·····	李 新 (50)
交文支队战斗在古交·····	郝石健 (54)
团结一切力量拔除草庄头据点·····	蔺民安 (61)
西阳曲战时贸易工作·····	武 忠 (67)
忆交城民族革命小学·····	张贵亭 (70)
虎口余生话当年·····	阎福成口述 康介荣整理 (77)
在我参加儿童团和妇救会的日子里·····	刘桂英 (81)
红军东征转战来古交·····	区志办供稿 (84)
怀念左良同志·····	郭丰瑞 郭炳炎 (87)
古交文史资料征稿简约	
·····政协古交工矿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89)

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简况

褚国荣

一、组建过程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晋西北军区第八军分区（一九四二年八月改称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以决死二纵队司令部为基础组建成立。司令员韩钧、政委王逢源、副司令员侯俊岩（工卫旅旅长）、刘德明，政治部主任廖井丹（未到职由王逢源兼）、参谋长李敏。一九四二年初，侯俊岩率工卫旅调第一军分区（兴县一带）。一九四二年春，刘德明在南沟战斗光荣牺牲。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接着毛主席发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据此，晋绥分局决定罗贵波同志任八地委书记兼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由张希钦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曙森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三年初冬，原冀中军区警备旅转移到晋绥边区，该旅旅长王长江任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吕怀忠任副参谋长，曹光琳任政治部副主任，李曙森调离后曹任主任。军分区的领导班子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二、武装部队

从一九四〇年军分区成立以来，军分区的部队主要是决死二纵队所辖的四、五、六三个团。一九四二年整编，二纵队番号撤销，将四、六团合并，编为八分区五、六支队，还有工卫旅所辖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团。一九四二年秋，工卫旅二十一和二十二两个团合并，统称为二十一团，旅部撤销，曾开赴晋绥军区第一、二军分区驻防。

一九四三年初冬，警备旅及所辖一、二、三三个团转来晋绥边区，将旅直属的一、二团留在八分区，改番号为一支队、二支队。同时由部队抽调干部在各县组织县游击队，在有敌人据点的区，组织基干游击队。解放战争开始，部队发展壮大，各支队都编为野战军，县大队都编为支队，可以离开地方机动调动。

三、管辖范围和对敌斗争

第八军分区地处同蒲铁路以西，汾（阳）离（石）公路以北，西连三分区，北接六分区，东临太原城。地区包括汾阳县的大部，文水、交城、清源、太原（县）、徐沟的全部，静乐、阳曲、离石（离东小东川）的部分地区。这个地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也是晋绥边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我争夺异常激烈。敌人曾以点线封锁的办法，除以太（原）汾（阳）公路，汾（阳）离（石）公路，离（石）岚（县）公路，忻（县）静（乐）公路，将八分区分割包围外，四〇年以来，在分区境内又

扎了许多据点，如协和堡、信义、五元城、东社、岔口、娄烦、利润、丰润、芝兰、古交、草庄头、赤尖岭等，我分区分区政权、部队活动范围渐渐缩小，敌人一年几次的进行扫荡，而且在夜间轻装偷袭，使分区分区军民常遭损失。但是八分区分区党政军民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把对敌斗争作为共同的头等任务，团结一致，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决心把敌人挤出去。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由部队抽调干部，组织武装工作队，配合武装部队围困各据点，即在据点周围埋设地雷，断绝敌人的水源，使敌人不易行动，不能生存，消耗敌人的弹药，使敌人不能休息，处于惊慌状态；伏击敌人的运输物资，给敌人造成补给粮食、弹药的困难；对敌人进行瓦解、策反工作，利用内线关系（为敌人服务的人员）给我军送情报，里应外合，奇袭敌人；在条件成熟时，集中优势兵力，硬攻敌人的一个据点，把敌人彻底消灭等。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到一九四五年夏，把分区分区境内的据点基本拔掉和挤掉。同时我军还主动出击了公路沿线的大据点，使交通线上的敌人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由于对敌斗争的节节得胜，根据地发展壮大，环境相对地稳定。从一九四四年春到一九四五年秋，分区分区机关驻在屯兰川关头村再未转移，保证了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毛主席电示晋绥军区，要其它各分区分区也“开展八分区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高度评价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

随着八分区分区形势的好转，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地委和分区分区分别召开了生产劳动模范（包括劳武结合模范）大会、战斗英雄大会，部队政治工作会议（一九四五年春），巩固和发展了八分区分区的大好形势，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四、交通和兵站工作

保障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之间交通安全，食宿方便，接送过往干部和文件、物资，是八分区一项艰巨的战略任务。这条交通线在八分区境内，不仅要经过汾河、同蒲铁路、太汾公路等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而且还要通过近百里行程的晋中平川敌占区。为了完成繁重的护送任务，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由分区部队组成交通队、地下交通队和情报站。此外，还常常派武装部队掩护，密切配合进行这项工作。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共接送过党的“七大”代表和其它干部二千多人，其中有：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陈赓、薄一波等许多党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同志。同时还护送过以金道凤为首的“朝鲜独立同盟”和“义勇队”国际友人几十人。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团掩护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通过敌占区，在交城东雷庄与大股敌人相遇，四团团长王何全在指挥战斗中光荣牺牲，炮兵团在其掩护下安全通过。

过往的干部、物资到八分区根据地以后，就由兵站来接待、转送。兵站还有运送前方作战需要的粮草、弹药，组织担架运输，接待和转运伤员的任务。兵站既是部队的后勤兵，又是部队的先行官。

八分区境内有三条兵站路线和三分区境内的兵站相接，一条是南线，在汾阳县境内有向阳镇兵站，杨家庄兵站；一条是西线，在交城境内中西川，有米家庄兵站，河西庄兵站；一条是东线，在交城境内屯兰川有五里铺兵站，原平川有原相兵站；在清源县境内白石沟有水峪村兵站。各兵站之间的距离是一天的徒步行

程，约六十至八十华里。

兵站的客房，都是事先把农村老乡的较好的且暂时能腾出的住房，预先号下，哪个房间住几个人都进行了登记。兵站供应的伙食，按标准每人一斤粮（主要是小米），二斤菜（主要是山药蛋），五钱油，七钱盐。为了照顾儿童、病员和领导干部，可以调剂细粮（大米白面），细菜（应时蔬菜）。

一九四五年秋，党的“七大”闭幕，紧接着日本投降。各根据地的“七大”代表要从延安回去，大批的干部要从延安分配到各根据地。由于形势变化，过往人员剧增，有时兵站一天要接待二、三百人。当时正值秋雨连绵，敌人在平川大肆活动，形成前边来的走不了，后边的又到了，兵站附近的村子都住满了过往人员，致使人的食宿，马的草料，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一时都成了问题。但由于分区的正确领导及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支援，兵站人员的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烧水、做饭，催粮催草，催运输工具，保证了过往人员的需要，使他们安全地经过晋绥边区的最后一站，顺利到达了目的地。中央军委的边章五局长和中南军区的倪志亮参谋长等首长，对兵站人员都曾给予表扬。

一九四六年夏，解放战争开始，兵站工作更加紧张，一切粮草弹药必须按数量、时间送到指定地点，前方来的伤员必须迅速转送野战医院。当时兵站是昼夜工作，灯火通明，粮草弹药堆积如山，担架驮驴聚集四海，人员往来如梭，显示了解放战争的一片忙碌景象。

（作者原任太原市二轻局书记，现已离休）

我在古交工作的片断回忆

任悟僧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山西牺盟总会派我到交城工作，任交城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副总队长是尹伊。当时正值“七七”芦沟桥事变不久，由于蒋、阎实行保存实力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从东北向华北长驱直入。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交城形势也紧张了。为了抗战需要，将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扩编为交城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夹岔一带（沙沟、米家庄）开展抗日游击活动，驻地在东社，和阎锡山的赵林（傅作义部队的团长）军住在一起。当时赵林想借与我党合作抗日之名，行扩充阎军势力之实，妄图吞并我们和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组成抗日游击师，由他控制。我坚决不同意，就到离石牺盟中心区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长程子华同志汇报了情况，赵的打算随之落空了。

十二月，我任清源县长，由离石到清（源）太（原）边山，途经古交。当时贺龙将军所率一二〇师三五八旅驻在古交，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唐天际。随同我们前来的有交城游击县长常芝青、秘书司正卿、牺盟特派员李根科（交城抗日县政府先在西冶川水峪贯成立，后搬到屯兰川营立村）。这时，古交已经组织了“阳交边区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西曲村人张生秀为主任，古交人阴霁为副主任，在我三五八旅指派专人的帮助下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派陈兴邦、薛

文教带领“敌区工作团”前来河口，建立行政机构，组织地方武装。五月间正式成立了“山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八专署”。专员陈兴邦（徐沟人）。管辖阳曲、交城、文水等九县。强迫解散战委会，将人员及武器全部接收。他的阳曲县政府住在河口镇，县长由八专署副专员薛文教兼任。八专署还组织了一支地方武装，开始称为游击支队，后扩编为“暂编第二旅”，旅长薛文教兼。八专署通知交城游击县政府接受他们的领导，被我游击县长常芝青严词拒绝。六月份接到上级党指示，县长常芝青和秘书司正卿才把政权交出。

是年冬，在三五八旅政工人员指导和帮助下，交城县狮子村（现属古交区）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阴贵英。战委会动员群众响应上级关于“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号召，积极捐钱捐粮，支持抗日。西岔村富裕户薛永宽捐献杂粮二百石、菜羊一百多只；娄子条村阴栓则、阴凡则兄弟两家捐出粮食五十石、菜羊六十多只；还有狮子村武富元、曹庄村王锦山等先后捐献了粮食。别的较大村庄也建立过战委会。

一九三九年一月，杨新来西阳曲开展工作，任工委书记。张兴业、毛碧浩先后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六月，郭维屏来西阳曲工作，任牺盟会特派员。

十二月，“晋西事变”起，阎军配合日军企图消灭新军决死纵队。我军工卫旅二十二团和彭三五八旅独立二团一营配合反击阎军暂编二旅。阎军溃败，旅长薛文教带残部逃到榆次黄彩一带，被我从晋东南北上的三八五旅等部迎头痛击，全歼暂编二旅，击毙薛文教、赵武才等。

一九四〇年一月，晋西北区第八分区专员公署，在交城屯兰

川麻会村建立了，顾永田任八专署专员。同年二月十二日顾永田牺牲后，康世恩任代专员、专员。

一月十五日，交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西冶川双龙镇建立，上级决定由我任县长。这时，阳曲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成立了，县长郭维屏。因抗日需要，上级决定将原阳曲辖汾河南大川一带村庄划归交城领导；原交城辖汾河北狮子河一带村庄划归阳曲县管辖。狮子村、嘉乐泉一带为阳曲一区；水头到河口一带为阳曲三区。交城孤偃山东南的石沙、原相、白岸一带划为交城一区，区长郑茂林；大川一带村庄划为交城七区，区长郭力现；屯兰川的麻会、营立一带划为交城二区，区长康守义。

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抓了政权建设、组织建设、恢复生产和对敌斗争几件大事。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扰害，加之阎锡山统治的黑暗，对百姓敲骨吸髓，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组织群众尽快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交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先在屯兰川麻会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发放救济物资，把阎锡山经营的关帝山牛场、羊场的荷兰奶牛六十余头、羊约七百余只，全部夺回分给贫苦农民。发放的原则是面向全县，重点照顾偏远贫困山区，如东、西葫芦一带分配的多一些。这一行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调动了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紧接着我们积极开展了“四项动员”活动。“晋西事变”后，我军集结在交城一带部队较多，计有一二〇师、决死二、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反顽固刚刚结束，需要很快地补充兵员，筹集钱、粮和军鞋。于是，在上级党委号召下，西阳曲抗日民主政府在一月就开展了“四项动员”。全县有四十多家大户出粮出钱，资助我们搞好建军建政。四月份，交城县抗日民主政府

也开展了“四项动员”，并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来抓。我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发动广大群众省吃俭用筹集物资，并且向一些大户人家积极动员，晓以大义，期望他们共同抗日，保国保家。他们中的大多数深明大义，情愿出钱出粮，如屯兰川麻会的张效曾之父张务本比较开明，积极响应“四项动员”的号召，自动献出白银。南头、东塔等村也有。交城的“四项动员”成绩较大，起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共同抗日”的作用。除动员大批兵员、交出军粮和军鞋外，很多富裕户还献出了元宝、白洋和金银首饰。偏远林区的农民还献出了贵重药物——麝香。这些物资一部分由县较府转交驻军部队，一部分送往兴县（晋西区党委所在地）。同时，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发现了好些进步的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为我们以后搞“三三制”政权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曾吸收过麻会的张效曾、裴家山的李杰山、科头的阎守智参加县政府工作，分别担任科长、副科长。东塔村的李惠民任过四区区长。原任旧县政府教科长的游波，也被我们吸收为抗日民主政府较育科科长。

在“四项动员”工作中，我们个别地方也发生过对地主老财“挖浮财”，强迫命令的“左”的错误做法。

在对敌斗争方面，我们组织了地方武装，县有游击大队，区有基干游击队，积极配合大部队作战。

一九四〇年三月，日本侵略军分别在古交、河口和草庄头扎了据点。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命令，在华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从一九四〇年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交城县三大队和县公安局协同作战，在交城

平川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断公路、割电线、捉特务、除汉奸、袭扰敌据点，积极配合我主力部队作战，使平川形势迅速向有利于我们的方面发展，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坚持抗战的斗志。阳曲县配合工卫旅二十一团袭击了忻县豆罗、平社两个车站的敌据点，掩护群众破路，攻打关口村敌据点，攻下两个碉堡，重挫了敌人的锐气。

是年冬，交城二区区长王国英带领几个区干部在武家庄村开会，专门讲征收公粮的事，第二天晚上被古交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村公所。区长王国英、区抗联秘书李建厚、区民政助理员张舒太、区妇救会秘书李青（女），还有雷震声等五人被捕。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供情报。王国英、李建厚、雷震声视死如归，毫不动摇，英勇就义。张舒太是屯兰川麻会人，靠伪区长张起鹏说情后保释。李青急中生智，冒名自己是裴家山李其昌（阎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侄女李丽，经伪区长张起鹏保释，幸免于难。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报复。一九四〇年冬，日军动用太原到汾阳的所有兵力约二万余名日伪军，进行了冬季大扫荡，仅交城山就反复扫荡了一个半月，敌人实行的是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阳曲县武委会主任郭良同志去三区工作，途中与敌遭遇，在南社村（现大南坪乡）牺牲。西阳曲县游击大队在高足梁被三百敌人包围，激战中敌死伤十余名。我方寡不敌众。敌进村屠杀群众五人，群众被捕十余人。日军不仅烧毁全村房屋，还把抓走的十余人在河口寨上集体屠杀，只逃出阎四旦一人，已成残废。

十月十五日，日军疯狂地将晋西北八分区嘴头炸弹厂捣毁，杀害了区小队长张掌子，伤亡工人群众二十三人，俘走二人。

看到我根据地人民被敌人蹂躏残杀、房子被敌人烧光、粮食被鬼子抢走或烧焦的种种情景，我们不仅没有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杀敌复仇的决心。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时刻牢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胆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并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村连村、庄串庄，随时掌握敌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每战必胜。

一九四一年秋冬之际，交城四区区长苏建益率领一支一百二十余人的精干的游击队，活跃在原平川南头、科头到梁庄一带。从原平川口石家河到川底科头、东塔一道川，每村设有情报网，遇有紧急情况，就用鸡毛信沿村转送。如信角上只插两根鸡毛，表示一般情报；如果信的四角上各插一根鸡毛，说明情况紧急，必须快速转送。信的内容都是暗语，例如驻扎在古交的日伪军出发了，那就不用画小米（日军的代号）和画黑豆（伪军的代号）的办法来表示人数、方向等。有一次，顺道村的汉奸“狼头五”假装成卖醋的，在南头村窥探我方情报，发觉我县政府干部正在南头开会，他赶紧跑回古交报告了日伪军。日伪立即出发奔袭南头村，但他们扑了个空，我们的情报传递很快，抗日干部早已转移上孤偃山了。日本鬼子以为“狼头五”看错了人，搞不准情报骗“皇军”，把“狼头五”打了个半死。

我们还在山梁上安了草人、草靶，白天敌人出发向哪里去，草人就向哪边倒；夜晚哪村有了敌人，哪村的草靶就点起了火。于是一有敌情，相距十几里路的村庄不到十分钟就可传到，便于群众空室清野，疏散转移。

一九四二年初秋，日本人又在西冶川芝兰、西阳曲三区的六家河、大南峪、南山上设了据点，更加疯狂地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

了扫荡加蚕食的攻势，并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使本来就贫穷的山区农民生活更困难了。我们的驻军和机关干部与民同甘共苦，经常吃不上油盐和蔬菜，有的同志患了浮肿病，有的患了夜盲症，有的冬天还穿不上棉衣。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并不悲观失望，而是想尽办法，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难关。

一九四二年，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并提出“把敌人挤出去”的口号。于是交城和西阳曲抗日民主政府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开展了减租减息、削弱封建剥削的活动。实行“一五减租，二五减息”的办法，减轻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同时又要保证交租交息。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上，各村组织了互助组，民兵实行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有情况就外出参战，配合地方部队，围困敌人据点。针对每个据点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以李立功同志（当时任交东三区区委书记）为首成立了围困芝兰据点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以清、太、徐游击四大队副队长廖步云同志为首成立了围困草庄头据点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围困办法除堵截物资、动员群众空室清野外，还有污染敌人的饮水源，用头发渣下井断水，把敌人困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最终达到把敌人挤走，或把据点拔掉的目的。芝兰据点的敌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溜走了，草庄头据点在同年九月十八日夜被我八分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配合拔掉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解放区人民奋勇杀敌，表现出我中华民族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凛然正气。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阳曲县委组织部长郭明远在三区石堂河领导区干部对敌斗争，被敌包括，战斗中被捕，解回太原，后受刑成疾，死于狱中，时年二十八岁。同月红条村被南山上据点日军包围，激战中我西阳曲一区区长王德兴被捕，武工队长洪宪新和队员郝绪保牺牲。

一九四三年春，杨新任阳曲县委书记，田忠仕组织部长，伍宇任宣传部长。阳曲五区的王俊德、张梅子，一区的张栓来、张耀盘等出席了晋绥边区在蔡家崖召开的群英会并受了奖。

是年，西阳曲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秋后全县交售公粮达二百八十万斤，军鞋四万双。

一九四三年冬，交城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开展了群众性的大造地雷活动。县委在原平川科头村召集各区、乡武装干部共同研究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一场反侵略、反扫荡的人民战争。首先解决武器问题，自力更生为主，就地取材，大造地雷。在科头村成立了第一个“军火合作社”，并号召有条件的村都要成立。不久，睦联坡在民兵队长张长栋带领下，也热火朝天地办起了“军火合作社”。为解决资金问题，县委号召群众开荒种“军火田”，打下的粮食作为投资股金。一时间，全县办起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土法造地雷合作社。汾河北岸盘道（后迁嘴头）铁厂制造地雷壳，上石沙村的狼窝沟也成立了铁厂，铸造地雷和手榴弹壳。为解决技术问题，每行政村选派一人往八分区在屯兰寨底村举办的教导队爆破组学习爆破。在配料、引爆装置等具体问题上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发动群众，群策群力，不仅造成铁雷，还造出了石雷。屯兰川西沟村利用烧瓷窑烧制瓷雷壳，北社村还自制手榴弹。在大造地雷活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发明家和模范，如睦联坡村的张长栋，石相沟的王旺则等，他们都参加了一九四四年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英模会。

屯兰川对坡村的高月明，在大皮山上扎了个草人，挺着个大肚子，歪戴一顶纸做的日本军帽，还画了青面獠牙的怪相。肚子上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鬼子看了气得直跳，边喊

“八格牙嚕，死了死了的……”，边端枪恶狠狠地向草人直刺。原来草人的头脚各装了一颗自发电雷，鬼子刺中草人的头部，“轰”的一声爆炸了，脚下的雷也接着爆炸，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其余的狼狈逃回古交据点。在原平川的南头、常安、曲坪、睦联坡间，敌人也常吃地雷。三道川的大造地雷活动蓬勃兴起，地雷战发挥了巨大威力，限制了敌人的行动，打击了日军的气焰，为挤走敌人，迎接全面抗战胜利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四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八分区地委在罗贵波书记领导下，开始在静乐县王家崖成立了整顿“三风”学习班，开学后移到交城县屯兰川关头村，故称“关头整风”。参加整风学习的除地委、县委和区委领导干部外，还有个别一般干部。整风分为四期，由地委副书记张永清直接抓，下设两个队，队长是胡亦仁和张先奎。第一期整风学习班是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至八月，接着是第二、第三期，最后一期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后结束。

一九四四年，西阳曲县政府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响应上级号召，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五十多人，在曹庄、正沟、黎园沟等处，开荒几百亩，种植小杂粮，收获杂粮一万余斤，超过了政府工作人员口粮三分之一自给的标准，节余的粮食还为冬季召开的县群英大会解决了伙食。

同年秋，县委决定由郭汝兰负责在西岔村开办了第一期纺织训练班，培养纺织骨干，解决群众穿衣难问题。邀请了河南逃荒到嘉乐泉定居的一位妇女当纺织师傅。学员是各区选送的，有区、村干部的妻子，有村妇教会骨干，约四十人左右。纺车每人一架，土织布机四架，学员轮流上机学织布。学习时间三个月，结业后，学员带纺车回村组织本村妇女学纺线。

一九四四年冬，西阳曲县三区南山上、大南峪、六家河三个日

军据点被我挤走。西阳曲县在一区南村召开了群英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百多人，会议开了三天。

一九四五年春，西阳曲县在象耳足开办了第二期纺织训练班。学员五十人左右，规模也大了，不仅有土机，还有快机。在纺训班里，不仅学纺织，而且学文化，使劳动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同时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

为了解决纺花织布的原料，是年春，西阳曲县在气候温和的川面地带大面积试种棉花，全县一、三、五、忻三区共种一千零七十亩，收获较好。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八分区十八支队在队长张九德、政委温绍光指挥下，包围了河口采矿部。当时那里驻日伪警备队八、九十人，我方俘敌四、五人，缴获步枪十五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无条件投降，河口据点的敌人撤走。同日，我军收复了石干峰、思西、关口、上兰村、马头水、化客头等敌据点。至此，古交往太原及附近地区全部收复，抗战取得胜利。

十月二十二日，新华社发表消息，报导了各地减租减息和农民纷纷买地，赎地的盛况。交东、阳曲农民也组织起来，走向翻身发展生产的道路。十二月十七日，《抗战日报》刊登了“阳曲治元冬季生产卖煤求多不求快，纺织求精不求多”的报道，反映了西阳曲群众抗战胜利后大搞生产建设的精神面貌。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至二十八日，西阳曲县进行了村、区、县层层选举工作，选举参议员，县议员。三月份，西阳曲县委在河口采矿部召开县议会。会议由县长赵希敏主持，八地委宣传部长胡亦仁参加，参加会议的共一百五十多人。会议选举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代表有刘晋有、白士根、陈栋亭等。